

历史春秋

又到一年毕业季，除了高考，毕业生找工作便是最热的话题。而要找工作的人，不论古今，不论中外，都是首先要展示出自己的才能，让需要用人的人看到自己的能力与价值，这样就有机会为之效力，施展自己的抱负。如辛弃疾所说的那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至于如何能让君王关注到自己，不同才能不同性格的人各有不同的方式。



图为李白醉酒于唐玄宗宫殿之内，由内侍一人搀扶侍候的情景（清代画家作品）



苏轼画像。

毕业季，古人如何「找工作」

仲冬梅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说到古人找工作，我首先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姜太公。“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个“愿者”，是愿意相信他、愿意任用他的人，也就是后来他遇到的周文王。姜太公钓鱼，与众不同，他用的是直钩，换言之，是没办法让鱼咬住之后无法摆脱的。这样的举动显然是怪异的，意不在鱼，而是通过反常的行为引起别人的注意，果然因此吸引了文王，历史上著名的一对君臣的遇合，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

俗语云“命运青睐有准备的人”。姜子牙这是一种准备方式，还有人有另外的准备方式。比如，东晋的袁弘。

《世说新语·文学》：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邀，大相赏得。

这段小故事里的袁虎，就是后来创造出成语“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袁弘。他年少时因为家贫，就替人做工运东西。清风朗月之夜，他在船上吟咏自己写的诗。这首先说明他是一个即使生活困顿，也懂得欣赏美好的人。冯友兰《论风流》中曾经总结魏晋风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妙赏”。而能妙赏，总是与玄心、洞见和深情密不可分。所以他的吟咏，就分外有情致。这已经很能吸引人了，更重要的是，他所吟咏的还是他自己写的诗。因此，大将军谢尚非常赏识他，不顾身份之别，邀请他来相见，从此之后，他的名声大噪，踏上了仕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李白不走寻常科举路

这段故事，让李白艳羡不已，他将之写到了他的诗歌里“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李白如袁弘一样能高咏，可是，世间已再没有谢将军了。这意味着李白的才能与抱负很难找到施展的机会。

就李白自己而言，他也是一个很擅长经营自己的人。他学成出川之后，先是在安陆一带漫游，其实就是一方面游览一方面结识那些可以引荐他的人物。在这个时期，他遇到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是第一个称美李白仙风道骨的人。李白《大鹏与稀有鸟赋序》中说：“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此，司马承祯将之介绍给玉真公主，玉真公主再将之介绍给了皇帝玄宗。因此才有了李白布衣而得皇帝诏入京的故事。李白接到诏书，兴奋非常，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别金陵儿童入京》，其中有句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到了京师，玄宗皇帝尚未召见他的时候，老诗人贺知章慕名来访，一见倾心，呼为“谪仙人”，并解金龟换酒。李白的声望，因此而更加显赫。

但是李白在唐朝是一个异数，因为他不属于走当时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通道：科举考试，而是希望自己“一鸣则已一鸣惊人。”所以走的是一条古意盎然的道路。

关于科举考试，中唐时期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唐朝士子的风气是考生在试前往往要把自己的诗文投递给某位很有声望的人士，希望赢得他的青睐及引荐，致使他很快地便被主考官关注，从而顺利取得功名。这就是所谓行卷。诗人朱庆余流传最广的诗《近试上张水部》就是这个风气下的产物。其诗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张水部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张籍。这首诗的另一个题目是《闺意上张水部》。诗本身是写一个等待拜见公婆的新娘子内心的忐忑，其实写的是参加科举考试的朱庆余自己内心的紧张与不安。张籍接到诗后，非常赞叹，于是回了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意思就是告诉朱庆余，你的诗写得非常好。果然！因为张籍的大力揄扬，朱庆余声名鹊起，也的确高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这个也因为唐朝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而成为佳话。

苏轼才华有口皆碑

简单地总结说，古人在“找工作”的时候，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他想辅佐的君王关注到他，意识到他是非常之人。包括文中写到的袁弘、李白、朱庆余，采取的都是同样的手段，不过是途径不同而已。

引起用人者注意的首先是要展示出自己的才能，其次时机也很重要。有两个大家熟悉的成语，“毛遂自荐”“脱颖而出”也是和“找工作”直接相关的故事。平原君要出使，想从自己的三千门客中选择二十人作为随从。可是，只选出了十九人，司马迁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记载：“门下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人二十人偕，不外家。合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平原君怀疑毛遂在门下多年都没有任何表现，毛遂回答说“使遂早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后来果然在毛遂的帮助下，平原君顺利完成了合纵的使命，也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成语。

如果我们纵览历史，会发现，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的时候，“人才”是有机会直接吸引到用人者的注意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选拔人才逐渐形成了一套机制，比如隋唐以来普遍实行的科举制，人才就需要纳入这套机制中来，才能得到机会。即使在这套已经非常完备的机制中，也有如苏轼那样的成功者。苏轼在四川的时候，曾经去拜会张方平，得到了张方平对其文章的首肯。在参加科举考试后，又以文章和应对得到了欧阳修和梅尧臣乃至仁宗皇帝的高度认可，苏轼的仕途之初，可谓充满了希望。不但他自己，整个的时代，朝野上下，都在等待着苏轼一展身手。



西汉长信宫灯

西汉长信宫灯，中国汉代青铜器，1968年于河北省满城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西南约1.5公里的山崖上）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绡墓中出土。2010年作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展品展出。宫灯灯体为一通体鎏金、双手执灯跪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袖似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此宫灯因曾放置于窦太后（刘胜祖母）的长信宫内而得名，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这是一件实用的汉代铜灯。宫女身体是中空的，头部和右臂可以拆卸下来。宫女的左手握着灯座，托起灯盘，右手提着灯罩，灯焰在圆形灯盘里燃烧，散发出的烟就通过右手排进宫女的体内，避免污染室内的空气。灯盘、灯座、灯罩都可以拆卸下来，灯盘还能够任意调节照射角度和亮度。可见这座灯的构思十分科学巧妙。

长信宫灯自其出土以来便被当作是我国古代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与民族工艺的典型代表备受赞誉。这不但是因为长信宫灯独一无二，极其珍贵，更是由于其精巧绝伦的制作技术以及独特的造型构思。

我们可以看到，长信宫灯改变了过去以来青铜器给人留下的神秘厚重之感，整个灯的造型和风格舒展自如、端庄大方属于一件实用且美观的珍宝，被誉为“中华第一灯”，闪烁着灿烂的艺术设计之光，不仅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内涵，也是先秦以来中国古代灯具发展成果的结晶。

宫灯不仅讲究写实，也追求神韵，努力为其赋予生命力，使这件艺术品拥有了在此之前青铜器所不曾拥有的独特艺术风格和魅力，因此，长信宫灯在不光是艺术、美学还是历史研究方面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杨道 辑）

陆游一生读书忙

赵柒斤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首诗可视为74岁的陆游向21岁的小儿子陆聿传授“阅读法”，即要从书本和实践中获取知识，也启迪每一位读者读书做学问要孜孜不倦、持之以恒。

陆游堪称活到老、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一生创作诗文万余篇，不仅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大部头，仅现存的诗歌就高达9000多首，唱响的金句多达600余条，实乃不折不扣的高产文学大家。

陆游是浙江绍兴人，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做过尚书右丞；父亲陆宰是藏书家，也当过京西路转运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母亲是北宋中期著名御史唐介的孙女。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如此背景使他从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熏陶，也养成勤读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

1127年前后，金兵大举南侵，被免职的陆宰，带着襁褓中的陆游南归故里，侥幸地逃过一场大劫难。自幼聪慧过人的陆游是典型的学霸，12岁能诗作文，因恩荫被授予登仕

郎之职；28岁进京（杭州）参加锁厅考试（南宋现任官员和恩荫子弟的进士考试），夺得第一名成绩，无形之中却得罪了权臣秦桧（秦桧孙子第二）。1154年，陆游参加礼部考试，秦桧暗中捣鬼不予录取。1158年，秦桧一命呜呼，陆游本该迎来出头之日，可坚持抗金的态度及刚直不阿的性格，又使他屡遭主和派排斥，多次遭贬。为回应主和派攻击，陆游干脆自号“放翁”进行反击。老年时，因赞扬和支持韩侂胄北伐，宋宁宗升他为宝章阁待制，陆游遂以此致仕，时年79岁。82岁时，他听到北伐彻底失败的消息悲痛万分，忧愤成疾，于嘉定二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临终之际，陆游留下了著名的绝笔《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然而，综观陆游一生，无论仕途多么坎坷，他勤读不怠的态度从未改变，并留下约250首与读书有关的诗，其中诗题中有“夜读”二字的高达67首，正如他在《冬夜读书》所言：“挑灯夜读书，油涸意未尽。亦知夜既分，未忍舍之形。人生各有好，吾癖正如此”。

此”。1165年，40岁的陆游在《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中写道：“腐儒碌碌叹无奇，独喜遗编不我欺。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该诗首联自叹为“碌碌无奇”的“腐儒”，只喜有古人的遗书可读，尽管诗笔平平，则蕴含他有不屑与世浮沉，坚持得自“通编”的“济世”理想之意。故而，尽管是头有“白发”逼近“老境”之人，对着“青灯”夜读，陆游仍觉意味盎然，像儿时读书一样。但凡是自幼好学，觉得读书有味之人，读此诗，都会沉浸于诗人描绘的夜读情景之中。

淳熙四年（1177年），五十三岁的陆游在成都写了一首《读书》七绝：“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这首诗如同陆游的学习体会，既反映了诗人在年老时仍坚持读书、苦学的情景，又表明他读书学习是为平民百姓而并无他求的可贵精神。

陆游六十三岁时作的《冬夜读书》：“退食淡无味，一窗宽有余。重寻总角梦，却对短檠书”，六十七岁时作的《五更读书示子》：“床头瓦檠灯煜煜，老夫冻坐书纵横。暮年於书更多味，眠底明明见华酒”，七十岁时作的《读

书》：平生爱客如爱书，力虽不逮意有余。年过七十眼尚明，天公成就老书生”，七十岁后创作的《风雨夜坐》：“寒风凄凄雨空蒙，舍北新丹数树枫，欹枕日游来眼底，掩书余味在胸中”，七十三岁时作的《读书》：“两眼欲读天下书，力虽不逮志有余。千载欲追圣人徒，慷慨自信宁兔愚”等，最能打动中老年人胸中的旧情和书味，把他们的欲言难言之境与情写得如在目前。

而七十五岁时作的《冬夜读书示子聿》：“圣师虽远有遗经，万世犹存旧典型。白首自怜心未死，夜窗风雷一灯青”，七十七岁时作的《自勉》：“臂弱传钞少，心烦记问衰。读书犹自力，爱日似儿时”，八十一岁时作的《读书示子局郁邠述》：“读书则未置，忍饥讲虞唐。古言不吾欺，岁晚犹汝食”，八十四岁时作的《读书至夜分感叹有赋》：“老人世间百念衰，惟好古书心未移。断碑残刻亦在椟，时时取玩忘朝饥”，八十五岁时作的《读书》：“少从师友讲唐虞，白首襟怀不少舒。旧谓皆当付之酒，今知莫若信吾书”等，则进一步彰显朴素的读书生活与爱书情怀贯穿了陆游一生。

《包身工》诞生记

慕津锋

1936年4月，夏衍在上海满怀悲愤地创作完成一篇名为《包身工》的纪实文学作品。该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报告文学。为了这次创作，1935年4月到6月，夏衍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对上海日资纱厂中的“包身工”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其实早在1927年，夏衍就开始接触纱厂工人。当年6月，“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发生后不久，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夏衍，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谷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夏衍曾特意从旧货店买了一套粗蓝布短衫裤，他还把自己的头发也理平了。根据组织安排，夏衍逐渐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工人朋友。1929年底，夏衍开始听到一些有关包身工的情况。当时，夏衍住在上海沪东唐山路业广里。业广里是工人区，与夏衍一起做工人运动的同志常到这里来“落脚”。在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夏衍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包身工们的非人生活。

1930年4月末，夏衍、沈西苓、郑伯奇、陶晶孙等人组建的上海艺术剧社（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一个话剧团），被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查封，并勒令解散。为继续宣传革命，夏衍与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老友冯秀英接上了关系，并组织流动演剧队到上海各工厂演出。在多次交谈中，冯秀英也告诉了夏衍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夏衍与冯秀英1928年就已经认识。冯秀英是上海出生的广东人，她早前在沪西某大学念书，后因家庭困难辍学，白天她在私立小学当教员，晚上在基督教青年会在杨树浦开办的工人补习夜校当教员。1928年，冯秀英已是一名坚定的、靠自己双手养活自己的独立职业女性和一名共青团员。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夏衍的好友、导演沈西苓想写一部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夏衍听后就把自己了解到的有关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沈西苓，并帮助沈西苓一起撰写剧本。由于创作需要，夏衍又搜集了一些有关包身工的材料。在搜集过程中，上海包身工的悲惨生活使得夏衍感到了“灵魂的震动”。

1933年，沈西苓根据夏衍等人撰写的剧本，拍摄完成电影《女性的呐喊》。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该片由于夏衍、沈西苓等人对包身工真实状况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加之当时的客观环境限制，以及拍成后电影又受到国民党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反映包身工的影片整体表现力并不很好。

在这次搜集材料、撰写剧本的过程中，上海包身工的凄惨境遇让夏衍感到无比的愤怒，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于是他决心去写一篇有关包身工的小说。1935年，因为一个偶然原因，在朋友的帮助下，夏衍终于有机会对上海“包身工”的现状进行实地调研并动笔创作。1934年10月到1935年2月，为配合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对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了三次大搜捕。随着中共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盛志亮的被捕与叛变，1935年2月19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先后抓捕中共中央局代书记黄文杰、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负责剧联工作的田汉等人，夏衍则幸免于难。根据组织要求，夏衍在中学同学的掩护下，暂时隐蔽起来。正是利用这次隐蔽机会，夏衍开始了有关包身工实地搜集调研工作。为全面真实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及工作现状，夏衍最初找到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同学帮忙，同学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带夏衍到包身工工作的车间考察过几次，这使得夏衍对包身工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直观感受。但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夏衍觉得还是不够。

为了得到第一手真实材料，夏衍只得又找老友冯秀英寻求帮助。之前，冯秀英其实已为夏衍提供了许多有关包身工的资料。但夏衍依旧觉得这些资料还不足以让他完成这部作品。很快，冯秀英便将她在补习夜校的学生，在日本纱厂做工的一名青年团员杏弟介绍给夏衍认识。杏弟对夏衍顺利完成《包身工》资料的收集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夏衍对她的评价是“她也是包身工那篇文字的最努力的协力者的之一”。正是在杏弟的大力帮助下，从4月初到6月，夏衍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终于比较翔实地观察到包身工的一些日常生活。

正是因为看到这些真实的残酷的场景，夏衍认为小说已不足以反映包身工的现实境遇，他认为自己应该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如实地、毫无保留地将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写出来。

1936年6月10日，报告文学《包身工》在进步刊物《光明》创刊号刊发。《光明》为半月刊，由洪深、沈起予编辑，生活书店发行。《光明》创刊号在社评中对《包身工》评价颇高：“《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纪录。”

《包身工》一经发表，便受到文学界关注。作家周立波在《1936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中，对该作品有一段非常中肯的点评：“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挚意的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刚刚萌芽，工人文学非常缺乏的现在，它有双重的巨大意义”。

正因为《包身工》的出现，以文学手法及时反映和评论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的新闻文体——报告文学，开始走入中国现代文学史。

（据《文艺报》。有删节。）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